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主 编：孙名之

副主编：陈收 李肇翔 金锋

逃避自由

ESCAPE FROM FREEDOM

[美] 埃里希·弗罗姆 (Erich Fromm) 著

刘林海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责任编辑

(按姓氏笔划排列)

韦尔立	王逸明	江红	孙进军	陈杰平
李乃庄	李正堂	李海燕	李荣贵	李璞
张贵来	杨华	崔曙光	曾林	傅芝发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出版说明

精神分析学说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创立的。弗洛伊德最初是作为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科医生来从事研究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歇斯底里症患者。他发现歇斯底里症的根源主要不是由于生理的原因，而是在于深刻内在的心理因素。他将这种内在的心理因素归结为儿童期被压抑的性意识，并由此创立了“无意识性本能学说”，认为神经症的发作就是性意识的长期压抑最后总爆发的结果。弗洛伊德将他的发现加以总结，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最富创见的心理学说，并将这一学说全面推广到哲学、社会、宗教、文化领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但是弗洛伊德的思想体系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他的全部学说贯穿着生物学观点，否认人性的历史性，否认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影响。随着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们不断批判性地发展弗洛伊德的思想，日益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逐渐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分裂和分离。1911年阿德勒就开始反对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强调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对人格发展的影响，建立了精神分析的个体心理学。此

后荣格也独树一帜地建立了精神分析的原型理论。尤其是 20 世纪 40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精神分析学派即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因强调社会文化的作用而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形成鲜明的对立，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妮和弗罗姆等人。其中弗罗姆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应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上，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分析的人本主义思想。

在精神分析运动中，尽管出现了不同的思想，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是精神分析学派总的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即强调儿童期的影响，强调压抑的作用，用病态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的人性等。精神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蓬勃发展，深入到西方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融合到了整个西方社会之中，成了西方社会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人性造成的戕害，以及后工业社会给人的精神造成的强大压力之故。

精神分析学说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传入我国，近年来出版界也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弗洛伊德的重要著作，但是都较为零散，未见系统。在我国，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入，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社会竞争日益增强，人们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由此造成的精神苦闷越来越多。尤其是儿童，从小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些压力和苦闷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缓解和宽慰，天长日久就会形成心理畸形和性格变态，导致病态人格或神经症。如何缓解精神压力，如何消除不良影响，如何避免病态人格，如何营造融洽的家庭氛围、和谐的社会环境，健康地生活和成长，这是我国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此，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希望能够给我国学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些参考。本译丛共 18 种，精心选取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荷妮和弗罗姆的经典之作，分别从性欲、社

会、生活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对人的病态心理——大至精神疾患，小至日常笔误、舌误等过失进行了深入的精神分析。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我所用，这一点无需我们多说。这套丛书是我们精心组织人力翻译完成。尽管如此，其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方家不吝赐教。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编辑部

1999年12月

逃避自由

[美] 埃里希·弗罗姆 著

刘林海 译

目 录

前 言	(5)
第一章 自由——一个心理学问题?	(7)
第二章 个人的出现及自由的模棱两可	(20)
第三章 宗教改革时代的自由	(31)
第四章 现代人自由的两个方面	(73)
第五章 逃避机制	(94)
第六章 纳粹主义心理学	(140)
第七章 自由与民主	(162)
附 录 性格与社会进程	(187)

前 言

几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研究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及有关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问题。这是一项很浩大的任务，全部完成，尚假时日。本书便是这项研究的一部分。目前的政治发展及其对现代文化最伟大的成就——个性及人格的独一无二的潜在威胁，使我决定中断大范围的研究，集中精力专门研究对现代文化和社会危机最要紧的一个方面，即，自由对现代人的含义。因为只有分析现代人的整个性格结构基础上，才能全面理解自由的含义，所以，如果我把已完成的研究我们文化中人的性格结构的成果介绍给读者，那我的任务就会容易得多。事实上，我也必须时常提到某些概念和结论，但囿于本书的范围，又无法详细解释。至于其他一些意义重大的问题，则往往只能一笔带过，有时甚至略而不提。但我觉得，心理学家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对认识当前的危机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

我认为，强调从心理学角度考察当前形势的重要性，这并不意味着过高估计心理学的作用。社会进程的基本单位是个人、个人的欲望与恐惧、激情与理性、选择善恶的倾向。要认识社会进程的动力，就必须认识运作于个人内部的心理进程之动力，正若要认识个人，就必须把他放在塑造他的文化环境里加以考察。本书的主题就是，前个人状态社会既为人提供了安全保护，又限制了人的发展。现代人摆脱了前个人状态社会纽带的束缚，但并未获得积极意义上的实现个人自我的自由，也就是说，他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及感官方面的潜

6 逃避自由

力。自由虽然给他带来了独立与理性，但也使他孤立，并感到焦虑和无能为力。他无法忍受这种孤立，他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逃避自由带来的重负，重新建立依赖和臣服关系；或者继续前进，力争全面实现以人的独一无二性及个性为基础的积极自由。虽然本书只是一种诊断而非预言，只是一种分析而非解决方案，但它也能给我们的行动指明方向。因为，要战胜极权主义势力，就必须首先弄清楚极权主义者竭力逃避自由的原因。

本书写作过程中，许多朋友、同事和学生给我很大鼓励，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批评，在此恕不一一致谢。读者将在脚注中看到本书吸取了许多作者的观点，在此要特别表示感谢。但是，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为本书的面世做出直接贡献的人。首先要感谢伊丽莎白·布朗小姐就本书的总体结构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批评；其次要感谢 T. 伍德豪斯先生帮助我整理原稿，感谢 A. 塞德曼博士在本书有关哲学问题上提供了帮助。

承蒙下列出版单位的特许，使我得以大量引用它们出版的资料。费城基督教教育委员会编译的 J. 加尔文著、J. 艾伦译的《基督教要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经济及公法研究，选自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J. S. 沙皮罗著的《社会改革与宗教改革》；密歇根州大急流城 Wm. B. 艾德曼斯出版公司出版的马丁·路德著、H. 科勒译的《论意志的不自由》；纽约哈尔考特、布雷斯公司出版的 R. H. 托尼著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波士顿休顿·米伏林公司出版的阿道夫·希特勒著的《我的奋斗》；纽约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 J. 布克哈特著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埃里希·弗罗姆

第一章 自由——一个心理学问题?

近现代欧美历史的中心便是人谋求自由，摆脱政治、经济、精神的羁绊。发起争取自由斗争的是那些渴望自由的被压迫者，反对的是那些维护特权的人。欲摆脱统治、谋求自身解放的阶级在斗争时坚信它在为人类的自由而战，因而可以以某种理想，吸引所有受压迫者，唤醒其内心深处隐藏的对自由的渴望。然而，在连绵不断的争取自由的漫长斗争中，曾经反对压迫的阶级在赢得胜利、需要维护新特权时，又成为自由的敌人。

尽管历尽曲折反复，自由还是胜利了。许多在战斗中捐躯的人坚信为反对压迫而死要胜于无自由的生存。此牺牲完全是他们个性的宣言。历史似乎证明人能自治、自决，以自己认可的方式思维、感受。社会发展急速靠近的目标似乎便是完全展示人的潜能。经济自由主义、政治民主、宗教自由及私生活中的个人主义等原则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人渴望自由，同时似乎使人离目标的实现越来越近。羁绊逐个被解除。人类推翻了自然的统治并主宰了她；推翻了教会及专制国家的统治。废除外在的统治似乎不但是实现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充分条件。

许多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最后的斗争，其结束意味着自由完全胜利。现存的民主似乎得到了强化，新民主取代了旧

的君主统治。但是，没过几年，新的制度便登台亮相了，它否定了人类确信无疑的在几个世纪的斗争中赢得的一切。因为这些新制度的本质便是除一小撮人外，所有的人都必须臣服于一个他们无法约束的权威。它有效地控制了人的整个社会和个人生活。

起初，许多人天真地以为权威制度的横行不过是一小撮个人的疯狂行为，其疯狂会使它应时而败落。其他人自鸣得意地认为意大利人，或者德国人缺乏足够时间的有效民主训练，因此人们只需静待他们达到西方民主政治的成熟状态。另外一个也许是最危险的错觉是，希特勒之流靠欺诈控制了国家机器，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纯粹靠武力统治；全部人民不过是叛徒和恐怖的毫无意志的目标。

这些看法的错误随岁月的流逝暴露无疑。我们被迫认识到数百万德国人那么如饥似渴地献出他们的自由，其热情不亚于当年为自由而斗争的他们的先辈们；他们非但不向往自由，反而想方设法竭力逃避它；另有数百万人则漠然置之，他们认为不值得为捍卫自由而牺牲。我们还认识到民主危机不仅仅是意大利或德国的特例，而是困扰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普遍问题。人类自由的敌人打什么旗号并没多大关系：反法西斯或直言不讳的法西斯旗号同样会威胁自由。^{〔1〕} 约翰·杜威早就断言了这条真理，我只需引其原文。他说：“对我们民主的严重威胁，并不在于外部的集权国家，而在于我们自己的个人态度和环境的法律习俗，它们使外在权威、戒律、整齐化一及依赖外国‘领袖’得逞。战场也正在这里——在我们自己心中，在我们的法律习俗中”。^{〔2〕}

〔1〕 我用法西斯或权威主义一词指代德国或意大利式的独裁制度。如果特指德国的制度，则用纳粹主义一词。

〔2〕 参见约翰·杜威《自由与文化》，1939年版。

如果我们欲同法西斯作斗争，就必须先了解它。良好愿望并无裨益，背诵乐观的教条像印第安人的祈雨舞仪式一样，终属徒劳。

除引发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问题外，还有一个人的问题急需了解。本书的目的即在于分析现代人性格结构中的那些动态因素，它使得现代人在法西斯国家里想放弃自由，并在数百万我们自己的人民中广为流传。

在讨论自由的人的方面，渴望臣服以及贪求权力时，引人注目的问题便是：作为人类经验的自由是什么？渴望自由是人性中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吗？它是一种无文化差别的共同经验，还是因个人主义在某一特殊社会实现的程度不同而相异？自由仅仅指没有外在压力，还是存在着某种东西——如果这样，是什么？社会中促使人为自由奋斗的社会经济因素有哪些？自由会不会成为沉重负担，使人无法承受，进而竭力逃避它？为什么自由是许多人的夙愿，又是其他人的威胁？

在天生的渴望自由之外，是否也可能有一种天生的臣服愿望？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时下那么多人臣服于一个领袖，对他趋之若鹜呢？臣服是否总指对公然的权威，是否也有对内在权威，诸如责任和良心，对内在的强制，对烦人的舆论之类权威的臣服呢？臣服中是否隐含着满足？其本质又如何？

使人贪得无厌地追求权力的原动力是什么？是他们旺盛的精力，还是人性的根本弱点及无能，使之无法自觉热切地体验生活？促成这些原动力的心理条件有哪些？这些心理条件又建立在何种社会条件之上呢？

对自由的人的方面及权威主义的分析迫使我们思考一个普遍的问题，即作为一种积极力量的心理因素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它又必然引发一个社会进程中心理、经济、意识形态诸因素相互交织的问题。任何了解法西斯主义对伟大民族产生吸引力的任何企图，都迫使我们认识心理因素的作用。因为我们在

这里面对的是一种政治制度，它实质上并非以利己的理性力量为原则，而是激发动员人的穷凶极恶的力量，而我们曾一度认为它并不存在，或者至少早已消失了。过去几个世纪里，我们一直认为人是理性动物，决定其行为的是利己原则及据此行动的能力。即便像霍布斯这样的哲人，尽管他认识到贪求权力和敌视是人的驱动力，可还是把这些力量的存在解释为利己原则的逻辑必然。由于人是平等的，故同样渴望快乐，又由于缺乏足够的财富使他们获得同等程度的满足，他们必然相互争斗，渴望拥有权力，以确保将来能享受现有的一切。但是，霍布斯描绘的景象过时了。中产阶级在打倒以往政治或宗教统治者的权力斗争中的胜利越大，人对大自然的主宰越成功，数百万个人的经济越独立，人就越相信一个理性世界，越相信人的理性本质。人们将人性中黑暗和邪恶的力量归咎于中世纪和更久远的历史时代，归咎于缺乏知识，或国王的奸诈及僧侣的阴谋诡计。

回顾这些岁月，就如同观看一座久已熄灭的火山。人颇感安全，坚信现代民主的辉煌成就已消灭了所有邪恶力量；世界光明一片，安全异常，像一个现代城市的街道那样井然有序。战争不过是远古的最后一丝残迹，仅仅再有一场战争就可消灭战争；经济危机纯属偶然，尽管这些偶然事件持续不断地周期性出现。

法西斯上台时，多数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始料未及。他们无法相信人怎么会如此嗜好邪恶，会如此贪求权力，如此置弱者的权利于不顾，如此渴望臣服。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这是火山爆发的前兆。尼采打乱了19世纪乐观主义的自鸣得意；马克思则殊途同归。稍后，弗洛伊德又发出了另外一个警告。可以肯定，他和他的绝大多数门徒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认识非常天真，他用心理学解释社会问题，多是误导性的；不过，凭借他对个人情绪及心理障碍现象的浓厚兴趣和刻苦研究，我们得以

到达火山顶部，俯瞰沸腾的火山口。

弗洛伊德引导人们注意观察分析决定人的某些行为的非理性和潜意识因素，这是他的任何一位前辈都无法企及的。在现代心理学上，他和他的门徒，不仅揭示了现代理性主义所忽略的人性中非理性及潜意识的部分，而且表明这些非理性现象有一定规律，因此可以用理性加以理解。他教会我们理解梦呓、身体症状及人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他发现这些非理性因素及个人的整个性格结构是对外部世界影响做出的反应，尤其是早期童年时代发生的那些事。

但是，弗洛伊德受他的文化精神影响太深，以至于他无法超出它所设置的某些局限。恰恰是这些局限成了了解病人的障碍；它们妨碍了他理解常态个人及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非理性现象。

由于本书重在分析整个社会进程中精神因素的作用，又由于这些分析基于弗洛伊德的某些基础性发现——尤其是有关人性格中的潜意识力量活动及其对外在影响的依赖性，我认为读者从一开始便了解我们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以及这种方法与经典弗洛伊德概念间的区别，是大有裨益的。^{〔1〕}

弗洛伊德接受了传统的人与社会基本冲突对立的观念及传统的性恶论。他认为人基本上是反社会的。社会必须驯化他，必须允许他直接满足某些无法消除的生物冲动（drives）。但社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必须净化并巧妙抑制人的基本冲动。在社会对人的自然冲动的压抑下，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被压抑的

〔1〕 一种以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成就为基础，但在许多重要方面异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方法见诺卡伦·荷妮的《精神分析新方法》，纽约 W. W. 诺顿及公司（1939年版），及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的《现代精神治疗学新概念——纪念威廉姆·阿兰森·怀特首次演讲》，载《精神治疗》，1940年版，第三卷，第1号。尽管二者相异之处颇多，此处所介绍的基本是二者相同的看法。

12 逃避自由

冲动变成具有文化价值的奋斗动力（strivings），而且成为文化的人文基础，弗洛伊德用“升华”一词来表示这种由压抑而成为文明行为的奇妙转变。如果压抑超过“升华”的能力，那么，个人就会患神经症，就必须减轻压抑。然而，一般地说，人基本冲动的满足与文化的关系是相反的；压抑越大，文化程度便越高（患神经症的危险也就越大）。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基本是固定不变的：个人基本保持不变，只是在社会对他的自然冲动施加更大压力（升华也增强了），或允许其得到更大满足（因此牺牲了文化）时，才发生变化。

像早期心理学家接受的所谓人的基本本能观念一样，弗洛伊德的人性概念主要反映了现代人最重要的冲动。弗洛伊德认为，其文化上的个人代表着“人”，现代社会里人特有的激情和焦虑则是植根于人的生物构造中的永恒力量。

虽然我们可以举出大量例子（例如，目前现代人怀有的敌视的社会根源，俄狄浦斯情结，女性所谓的阉割情结），但是，我只想再举一例，它非常重要，关乎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的整个概念。弗洛伊德总是从与他人关系的角度考察个人。然而，弗洛伊德认为这些关系同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个人与他人的经济关系一样别无二致，人人凭自己的运气，为自己工作，而非首要地与他人合作。但他并非鲁宾逊·克鲁索。作为顾客、雇员或雇主，他需要别人，他必须买卖、给取，市场，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劳务市场，规范这些关系。这样，最初本是形单影只、自给自足的个人与他人发生经济关系，只是达到买卖目的的一种手段。弗洛伊德关于人的关系概念基本是一样的：充满天然生物冲动的个人为满足这些冲动，必须与其他“对象”发生关系。其他个人便总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式，以满足那些在与别人发生关系之前产生于个人自身的冲动。弗洛伊德所谓的人类关系领域便类似于市场——系一种满足天然生